

中国外交时代方位坐标的 叙事组合分析^{*}

徐 进 杨佳霖

【内容提要】 中国外交的“东西南北”时代方位坐标有助于客观认识和把握国际格局中的力量构成、发展方向和内在矛盾等特征。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不同历史阶段，“东西”叙事和“南北”叙事往往随着体系结构和国家间战略关系的演化而不断调整各自的内涵、重点和彼此之间的次序，使国际格局的战略矛盾不断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作者从概念界定、关键机制与研究推论出发，构建了以“东西—南北”互动为核心的“生成—组合—演进”逻辑分析框架，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个历史阶段作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外交中关于“东西南北”整体叙事的形成、组合和调整路径。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东西南北”关系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历史性变化，“东升西降”和全球南方话语出现了调整、迭代与互构进程。叙事组合视角既有助于分析“东西南北”话语的出场语境、形塑历程和实践指向，也有助于有效把握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在不断调整、分化与重组中的新态势。

【关键词】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代方位坐标；叙事组合；“东西南北”话语；全球南方

【作者简介】 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杨佳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6）06-0074-22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文化根基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YZD04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通常将“东西南北”这样的空间方位名词作为定位世界所处的时代特征以及自身所处时代方位的坐标轴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并将该话语同时代主题和国际主要矛盾联系在一起。^①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邓小平指出：“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②“东西南北”具有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上的复合含义，其中“东西”方向突显的是政治维度，“南北”方向突显的是经济维度。

当前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东西南北”问题的坐标、中国在坐标系中的位置以及发挥的作用也呈现出新的形态。^③“东升西降”和“全球南方崛起”的叙事迭代、联动与相互强化的进程体现中国在探索人类和平与发展进程中所做的积极努力。然而，中国的努力持续受到了西方话语体系的挑战。^④如有西方学者开始质疑中国作为全球南方成员的身份。^⑤有鉴于此，学界需要准确解释“东西南北”这一外交话语的描述对象、内涵构成和规范取向。

本文认为，“东西南北”为中国确定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时代坐标。叙事内容、重点以及次序的变化是中国外交中“东西南北”问题得以生成与演变的重要中介维度。本文按照时间演进脉络构建主叙事与子叙事的双重分析框架，系统探讨“东西”叙事与“南北”叙事组合的形成与转换，尝试为这一问题的叙事变迁提供一个动态的解释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还着重分析了多元叙事标识和意义建构方式的互动与调适。基于“东西”叙事与“南北”叙事的可塑性框架，中国与时俱进地调整和构建了自己的身份和利益，通过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国际战略矛盾不断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在与其他国家的对话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塑造。

① 徐进、李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4—4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5 页。

③ 陈利君等：《回顾与展望：中国周边外交与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十周年》，载《南亚东南亚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16 页。

④ 殷之光：《全球秩序研究的理论贫困与现代化多样性的实践——一个全球南方的视角》，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8 期，第 99—113 页。

⑤ 如约翰·伊肯伯里提出中国应属于“全球东方”。参见 G. John Ikenberry,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1, 2024, pp. 121–138.

二、既有研究评述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西方学者将“西方”和“东方”作为划分“内部”与“外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话语实践，^① 这些概念一直是国家身份及其对外政策选择的重要因素，反映了行为体特定的战略思维、地理想象和秩序愿景。^② 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分析路径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东—西”“南—北”概念范畴的情境、关系内涵及其当代意义进行了阐释。

一是从地缘权力关系角度出发，讨论国家需求和世界形势变化如何促使“西方”与“东方”发生演变并日益固化为具有特殊内涵的国际政治概念的过程。19世纪后期，美国出于参与欧洲权力平衡的需要，延展了“东方”和“西方”在概念上的边界与内涵。有学者认为，“世界文明中心由东向西运动”的社会思想与帝国思想汇聚，成为推动美国海外扩张的强大动力。^③ 也有学者强调，“东西方”非但不是过时的概念，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西方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排序”。^④ 还有学者指出，在权力作用下，“南北关系”长期从属于“东西关系”的对立逻辑，使“西方”和“东方”成为一组具备整体性和结构性差异的概念。如尼古拉斯·利斯（Nicholas Lees）认为，传统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南北”鸿沟表现出强烈的延续性。^⑤ 伊弗·诺伊曼（Iver B. Neumann）等认为，东西方鸿沟至今仍是欧洲内部占主导地位的认知框架，深刻影响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内部治理的改革方向。^⑥

二是从文明标准视角切入，认为“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话语区隔带有文明

① Roberto Farneti, “Cleavage Lines in Global Politics: Left and Right, East and West, Earth and Heaven,”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17, No. 2, 2012, pp. 127–145.

② Kenneth N. Waltz, “East–West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in Zhao Yongyao and Liu Fei, eds., *East and West After the Cold War*, Cass Press, 1997; Geir Lundestad, *East, West, North, South: Major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 1945* (6th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2010.

③ 胡欣：《美国帝国思想的对外政策含义：对国家身份、意识形态和国际秩序观的历史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5页。

④ 高程：《西方大国推行“负和博弈”下的国际秩序变革》，载《人民论坛》，2024年第5期，第82—86页。

⑤ Nicholas Lees, “The Brandt Line After Forty Years: The More North–South Relation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7, No. 1, 2021, pp. 85–106.

⑥ Iver B. Neumann, *Uses of the Other: “The East” in European Identity Form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Clara Volintiru, et al., “Re-Evaluating the East–West Divide 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31, No. 3, 2024, pp. 782–800.

标准的等级制内涵，因此也附带了某种线性的历史演进方向。例如，德国人在波兰人身上看到了“东方”，波兰人在乌克兰人身上看到了“东方”。^①日本通过将俄罗斯“东方化”，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成功确立了自身的“西方”定位。^②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在2012年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表示，“希腊本质上是一个东方国家”，并称1981年批准希腊加入欧洲共同体是个错误。^③这种自上而下的文明投射奠定了多国的身份认同和对外交往框架。国际关系学、历史学和外交学领域的相关学者指出，美国在西方内部的崛起及其突破西半球势力范围的需求进一步催生了分隔“西方”和“东方”空间的文明断层线标准。^④美国海权战略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主张，战略竞争的焦点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应该主导整个地球以控制它的未来”，他判定“大西洋两岸”应该“结合在一起”。^⑤马汉的观点为“西方”与“东方”的概念范畴提供了新的议题。有学者认为，北美洲与欧洲共同学习、传播并运用“大西洋”叙事成为二者共同延续西方叙事以及实现对德国和俄罗斯双重遏制的重要框架。^⑥在针对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化的分析中，“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的话语和叙事倾向同样受到学界的关注。^⑦其中，人类学、历史学、传播学和区域研究等学术研究为这种叙事竞争提供了知识的支撑。

三是从世界体系角度出发，对“东方”社会性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入分析了苏俄（联）及共产国际领导人关于“世界革命”的“东方战略”等问题，^⑧考

① Elzbieta Anna Kwiecińska, *A Civilizing Relay: The Concept of the "Civilizing Mission" as Cultural Transfer in East-Central Europe, 1815-1919*,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21.

② Jie-Hyun Lim, *Global Easts: Remembering, Imagining, Mobiliz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③ "Seventeen Countries Were Far Too Many," *Der Spiegel*, September 11, 2012.

④ Marco Mariano, ed., *Defining the Atlantic Community: Culture, Intellectuals, and Policies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Routledge, 2010; Georgios Varouxakis, *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5.

⑤ Alfred T. Maha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 Kennikat Press, 1970, pp. 243-259.

⑥ Dianne Kirby, "Divinely Sanctioned: The Anglo-American Cold War Alliance and the Defenc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Christianity, 1945-4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5, No. 3, 2000, pp. 385-412.

⑦ 徐步：《“东方”与“西方”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载《学习时报》，2022年5月30日。

⑧ 余伟民：《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及东方革命的展开》，载《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1期，第25—41页；马建标：《重新发现“东方”：1920年代前期中苏交往的国际视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0期，第156—164页。

察了东西方格局之间的互动。^① 受此影响,世界体系视角充分关注了亚欧大陆、欧非大陆间以及西方内部的中心—边缘体系。有学者考察了发展问题如何与南北问题挂钩^②以及全球南方为何取代了“第三世界”的称谓,^③ 既有的东西方认知如何影响联合国改革和国际发展方向等议题。^④ 既有研究还提出,中东欧国家试图超越冷战时期的分析框架,将自身定位为东西方之间的“渡船国家”。^⑤ 在主动融入全球相互依存体系的进程中,全球南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水平经常被要求符合“北方国家”的预设标准。有学者对此提出,新兴政治实体应突破国际秩序中的不平衡和不对等关系,在多样化的背景下实现新的权力与主体性塑造。^⑥ 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东方世界性权力与“后西方国际体系”兴起的秩序观。^⑦

从上述分析来看,学术界已经从地缘权力、文明标准与世界体系等维度对“东西南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从各自视角阐释了“东西南北”问题的提出语境、地理和政治组成以及研究重点,分析了其中的演变机理和前景。但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既有研究未能充分关注“东西南北”问题彼此间为何能形成多元的叙事组合并随着时序的变化发生转换,二是对中国立足自身历史文化资源与外交实践所形成的“东西南北”问题的视角缺乏整体性关注。既有研究往往以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关系遮蔽对“东—西”和“南—北”问题的本质及其复杂关联的认知,进而对“东升西降”“全球南方崛起”等重大叙事的内涵和演进方向产生误判。

① Masha Kirasirova, “The ‘East’ as a Category of Bolshevik Ideology and Comintern Administration: The Arab Section of the Communist University of the Toilers of the East,”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 18, No. 1, 2017, pp. 7–34; James Mark and Paul Betts, eds., *Socialism Goes Global: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Age of Decolon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② Sara Lorenzini, *Global Development: A Cold War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③ 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载《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第79—90页。

④ Boris S. Vaganov and Abram B. Droumkin, “East–West Rela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Development: Is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easible?” in John P. Renninger, ed., *The Futur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24, pp. 191–203.

⑤ Marko Lovec, Kateřina Kočí and Zlatko Šabič, “The Stigmatisation of Central Europe via (Failed) Socialisation Narra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24, No. 4, 2021, p. 890; Laszlo Bruszt and Visnja Vukov, “Core–Periphery Divisions in the EU? East–West and North–South Tensions Compared,”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31, No. 3, 2024, pp. 850–873.

⑥ Siba Grovogui, “A Revolution Nonetheless: The Global Sout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Global South*, Vol. 5, No. 1, 2011, pp. 175–190.

⑦ 张建新:《后西方国际体系与东方的兴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第4—20页。

三、“东西南北”方位话语的叙事分析框架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施动者通常通过对外叙事呈现对自我身份的理解,进而赋予外部世界意义,并将受众群体纳入叙事构建,形成主体间性意义。^①叙事沉淀为话语,能够塑造国际社会中的共同语言结构。^②“东西南北”这一方位话语是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演变的重要工具,普遍存在于各国的身份、角色和内外关系的认知与实践中。各国在确定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塑造自身角色、确立各方面对外政策以及制定国家内外战略目标的过程中,都需要设定叙事主题和叙事逻辑,从而展示国家发展道路以及建构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中国外交中的“东西南北”话语与叙事也遵循叙事框架的部署和演进逻辑,进而形成了自身的实践路径。通过对叙事生成机理、演变逻辑与互动过程进行分析,本文揭示了施动者采用的叙事模式以及模式间的转化机制,并尝试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叙事构建规律,进而从外在的方位叙事表征反推出行为体内在的决策逻辑。

(一) 作为话语呈现载体的叙事

在国际关系中,叙事是指特定事件的“情节化”,即通过一连串具有场景、角色以及因果关系等模块的激活、编码、重申、再阐释和替换,构造出一套具有结构性和时间性的政治话语、修辞表达和意义建构方式。^③施动者通过将一系列事件归纳成某种特定的语言结构,有意识地对现实进行再现、解释和构建,从而影响受众的认知和判断;受众具有突出的能动性,要求在关联互动中形成认同。^④在形成和处理话语时,施动者始终会基于时空方位和价值情态“定位”其他话语实体。^⑤从话语空间理论角度来看,施动者与受众在时间维度、概念距离尺度及情感和态度上存在差异,这会影响话语策略与政策变迁的节奏和方向。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叙事成为话语呈现的载体。时间是叙事的内在要素,而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叙事生成

① Christian Bueger and Frank Gadinger,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eory (2nd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② 孙吉胜:《大变局下国际政治话语研究的新态势》,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5月14日。

③ 阿利斯特·米斯基蒙、本·奥洛克林、劳拉·罗塞尔著,孙吉胜等译:《战略叙事:传播力与新世界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8、186页。

④ 郭晓婷:《俄罗斯对世界秩序的话语建构与叙事模式分析——基于2014—2024年普京在瓦尔代年会的主题致辞》,载《俄罗斯研究》,2025年第2期,第105页。

⑤ Paul Chilton,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2004.

意义的基础。^①

在中文知识体系中，叙事又称序事，其传统可追溯至《周礼》，该概念与时间和空间的位置顺序有关。叙与序、绪相通，体现了某种“暗含秩序感”的材料择取、事物安排与讲述叙说逻辑。^② 这使叙事与框定和修辞等国际政治中的具体语言要素存在不同之处，叙事更强调一种具备整体性、连贯性的认知结构和“故事呈现”。

叙事不仅是一种交流、沟通和创造情感联系的基础形式，还经常被各类政治行为体使用。叙事能够有意识地对社会事实进行合法性塑造，进而阐明行为体的身份性质和角色地位等社会属性，并将由此生成的主体性意义制度化。通过对内明确政策路线、动员社会资源，向外投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和争论性共识等方式，行为体能够将叙事具象化，以掩盖或实现特定利益。因此，叙事要转化为可被他者接受的社会事实，关键在于建立话语与实际政策供给之间的联系，并在时间维度上持续延展，从而发挥认知、描述和呈现等多重作用。

基于上述叙事话语机制及其作用逻辑，“东西南北”方位成为中国指代国际秩序构成要素及特征的常规性政治话语。话语实践涉及叙事组合的创制，话语叙事则可以集中呈现一国对国际秩序目标和规范基础的“构成性纲领”。^③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及其变化的认识日趋深入，形成了自己的“东西南北”方位话语，从而有效地呈现出对国际环境、自身身份和立场的判断，逐渐突破了外在国际格局对自身国际定位和行为的结构性约束。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东西南北”表述国际秩序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国能动地放置（positioning）自身并就世界秩序以及自身未来发展形成规律性认识的叙事实践过程。中国在实践中不断摆脱对“东西南北”既有议题的回应与话语追随，创造性地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不断取得进步。

（二）特定叙事的形成逻辑

话语的整体性意义依赖叙事进行构建。“特定的语言一旦形成，其结构性、差异性和关联性等内在特点就会形成一种话语秩序。”^④ 话语秩序构成了叙事实践的场域。

① 陈一峰：《叙事、叙述与话语权：一个国际法的叙事学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第42页。

② 刘亚律等：《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0页。

③ 陈拯：《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构成性纲领刍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10期，第42页。

④ 孙吉胜、袁莎：《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的源起、现状与前景——孙吉胜教授访谈》，载《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5页。

通过叙事情节、结构和多模态要素的安排，相互联系并彼此影响的叙事要素能够形成体系，进而产生出单一要素本身所不具备的整体性功能。因此，施动者不会仅依赖单一的叙事话语行为，而是通过构建复数叙事来形成意义网络。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提出，不同叙事的组合和交汇能够有效加强叙事的可信度和传播力。^① 在国际关系领域，政治行为体同样必须通过策略性地组合和运用不同叙事来框定对外政策选择的期望环境和行动范围。施动者通过事件的联动和情节安排形成叙事组合，进而塑造自身的预期和互动方式，并在此过程中形成鲜明的政策选项。叙事组合的构建包括主叙事和子叙事两个维度。主叙事从某个基本概念出发形成语言结构，进而产生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叙事，能够为施动者提供核心的身份认同和行动指南。子叙事是由主叙事衍生出的派生叙事，主要用于回应具体议题并提供多元政策选项。主叙事和子叙事在某个时间点的交汇就会建立整体语境，进而形成叙事组合。^②

就叙事导向自我合法化的过程而言，叙事方式有一定的黏性：叙事一旦确立，便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和影响力，即使面对新的环境，也可能优先沿着既定路径发展。^③ 主叙事会利用预先存在的认知框架和意识形态巧妙地影响受众的接受度，使叙事深入受众群体的内心。就叙事参与对外互动的过程而言，面对外部反馈或环境变化，施动者在特定主题之下会以派生形式形成较小规模的叙事，有意识地推进某些更符合话语情境的针对性解释，在维持叙事的一致性与可接受性的同时，实现受众情感的激发和转化。叙事组合将共同作用于施动者的政策选择。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持续上升，中国的外交话语及其意义建构方式的演化呈现为叙事与再叙事的过程。中国聚焦实践变革，注重“东西”坐标与“南北”坐标的互动和互嵌过程，构筑起“东西南北”坐标系之间共有的经验和结构关系。这些组合突出自我定位，体现了行动路线中的价值内涵，进而揭示了外交话语中的通约性逻辑。

（三）时序演进中的叙事变迁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塑造一般会经历多方之间的争论、说服、压制和塑造过程，在形成“话语势能”后推动变革。^④ 这种态势构建主要通过叙事的历时性互动与转

① 罗伯特·希勒著，陆殷莉译：《叙事经济学》，中信出版集团 2020 年版，第 50、116 页。

② “叙事组合”又称“叙事星座”，参见罗伯特·希勒：《叙事经济学》，第 28—29、93—95 页。

③ Oliver Turner and Nicola Nymalm, “Morality and Progress: IR Narra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visionism and the Status Quo,”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2, No. 4, 2019, pp. 407–428.

④ 陈拯：《“话语势能”构建与国际话语塑造》，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2 期，第 156—174 页。

换机制体现出来。随着时序变化，为适应国际环境和话语场，政治主体的叙事组合会进行调整和转换。在国际话语场域中，叙事的选择与迭代并不是单向的，而是要考虑叙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各方会根据彼此的叙述策略进行相应的叙事整合与意义交换，进而铺垫与编织新的认知框架。我们可以用传播学的“叙事传输”（narrative transportation）概念来描述叙事的构建过程。受众通过叙事被代入主动角色，从而在情感、认知和想象上进入叙事并接近叙事中的论断。^① 当叙事情节呈现负面或冲突结局时，受众可能参与对该结局的“异常重新策划”。在这种情况下，施动者能够努力实现与受众之间的对话和调适，并促使受众转变行动方向。^② 这种互动关系及其过程是推动社会意义和社会结果生成的重要环节，决定了叙事被有效接受、内化以及重构的空间。在一定的国内外条件和语境中，我们可以从竞争和涵化两个角度来理解叙事互动与转化的具体实践形式。叙事竞争不仅意在改变受众对叙事真实性和合法性的看法，还可以借助叙事的部署和运作挤压对手的话语空间。叙事涵化是指将彼此可接受的要素逐步内化为共享的意义框架并最终形成共识的过程。经过充分的争论和涵化，行为体可以调整利益、偏好和身份。叙事在不同时段不断被整合、重申、替换与再阐释（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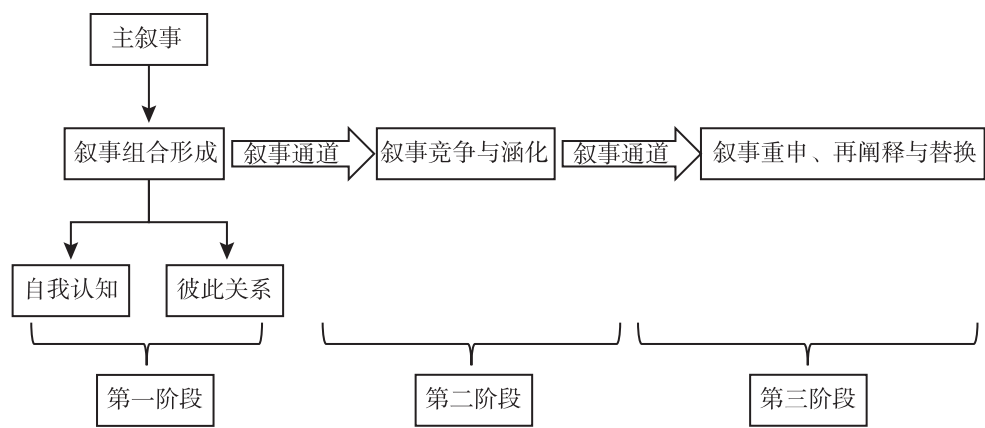


图1 叙事互动与转换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Melanie C. Green and Timothy C. Brock, “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Persuasiveness of Public Narrati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9, No. 5, 2000, p. 701.

② Subotić Jelena, “Genocide Narratives as Narratives-in-Dialogue,” *Journal of Regional Security*, Vol. 10, No. 2, 2015, p. 177.

上述分析表明,叙事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叙事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稳定的主叙事,以其统摄不同领域的子叙事并为对外交往提供合法性。其次,叙事存在延展性,经过叙事通道,子叙事在互动中不断被引入、交汇与补充,进而形成复合叙事组合,为制定相应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提供政治引领。^①最后,叙事的稳定性与变化性在形成、投射和接受的循环中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判断与问题解决。

下文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东西南北”概念及自身国际身份定位所展开的话语实践活动,尝试识别出其中蕴含的叙事要素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国外交话语在时代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一致性,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叙事变迁的过程。下文通过捕捉与刻画外交叙事内容、对象和主题来分析叙事产生的条件和机制。

四、中国外交中“东西南北”方位的叙事建构

在新中国的不同历史阶段,“东西南北”话语所反映的形势与任务、对象与内容以及方式与方法在保持内在稳定性的前提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分析中国外交围绕“东西南北”方位的叙事变迁,可以较为清晰地发现叙事策略如何在实践中得以构建、组合与转换的规律。

在中国的外交叙事体系中,“屹立于世界东方”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的自我身份认同构成了长期稳定的主叙事框架。围绕这个主叙事,涌现出多个子叙事,这些子叙事又通过吸纳新的叙事对象和主题,解决了中国对外交往中的许多实际问题,进而产生了非线性的累积效应。多个子叙事在关键时点交汇,形成了“独立自主、团结联合”的复合叙事组合。随着时序的演进,“东西南北”叙事形成组合,并在调整与转换的过程中塑造政策预期,对中国的外交决策发挥了重要的约束与激励作用。本部分基于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三个阶段性案例,分别检验并阐释了上述叙事框架的生成与演进规律。

^① 叙事通道是指不同叙事主体之间进行叙事整合和意义交换的互动空间与传导机制。叙事通道将受众“传输”到特定情境,从而促成叙事间的对话与再诠释,强化叙事主体间的共有认知和信念,它借鉴了“叙事传输”理论中受众与叙事产生认同与移情的核心机制。参见 Tom van Laer, et al., “The Extended Transportation-Imagery Model: A Meta-Analysis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onsumers' 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40, No. 5, 2014, pp. 797-817.

（一）第一阶段：主叙事的确立与叙事组合的初步形成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东方文明与东方落后国家开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视野中初步确立了中国将“屹立于世界东方”以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贡献作为主叙事框架。这里的叙事起点与冷战时期一般意义上的东方有所不同。^① 在中国外交话语中，“东方”叙事的范围和重心在不断发生变化。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现实基础上，“东方”叙事意在运用“民族解放”“独立自主”等叙事主题来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扩大对外交往的途径。通过将和平与发展议题与亚非拉地区的团结合作相结合，中国外交中的时代方位坐标开始耦合。中国认识到南方国家被视为农业国家和原材料市场的指向与中国自身的身份、处境和目标具有相似性，并不断通过“团结联合”等子叙事的构建，强化了彼此间的认可。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政治格局被美苏两大阵营主导，这一格局不仅定义了世界秩序的基本框架，也制约了中国外交话语的视角与逻辑。在此语境中，中国将“世界东方”的历史方位作为主叙事，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方面寻求相互认可的共同体。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领导人的表述中，朝鲜、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是“东方”国家，“民族解放”叙事主题符合东方阵营的普遍界定。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有意识地建构了新的国家身份，发挥中华文明天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内在特征，提出日本和印度同属于“东方”国家，应共同维护亚洲太平洋区域的和平。^② 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指出：“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③ 其意在构建“东方”内部的政治信任与团结。中国用“独立自主”叙事主题定位国家间关系，体现了新中国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现实基础上寻求扩大对外交往途径和积极提升国际地位的努力。

在这一阶段，中国对“东方”国家和“东方”民族的定义和定性并未简单沿

① 毛泽东指出，“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包括朝鲜、日本、印度、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相关地区代表参加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建立“东方的ABCD阵线”。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6—337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6、28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61页。

袭冷战时期以紧张与对峙为标志的东西方阵营逻辑，而是体现出不同的叙事组合与意义指向。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要求改变西方殖民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剥削状态，我们要求发展亚非各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① 亚非会议反映的万隆精神象征着作为实践的“第三世界”开始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降，毛泽东重提“中间地带”概念并对其做了具体分析，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外扩大和建立新的对外政治经济联系，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东方”的认知和战略选择继续发生变化。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陈毅作报告时强调“占有世界大多数人口”的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觉醒”，认为这些国家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各不相同。^② 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在回答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提问时指出：“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③ 1963年，周恩来在回答开罗《消息报》记者提问时再次将阿拉伯国家带入“东方”的话语表达范围，强调“我们同阿联一样都是东方国家”。^④ 至此，主叙事下“民族解放”“独立自主”“团结联合”等多个子叙事生成并实现了初步交汇（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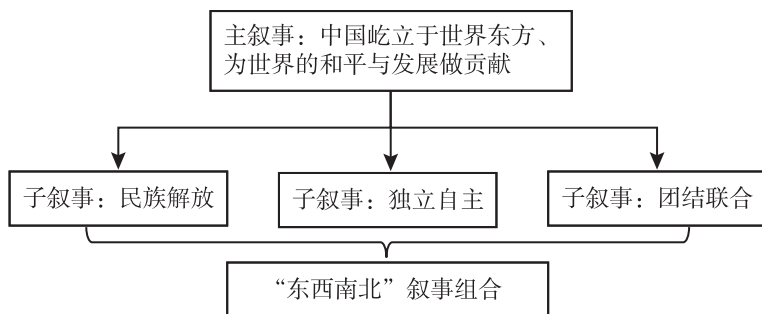


图2 “东西南北”主叙事的确立与叙事组合的初步形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16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目前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政策 国务院副总理 陈毅同志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26日。

③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84页。

20 世纪 70 年代，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推动东西方关系重新定位，促使东西方国家相互了解与对话。^① 1975 年，邓小平访问法国并在讲话中提出：“欧洲和亚洲实际是一个大陆，你们在西边，我们在东边，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② 这表明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开始强调多样化世界的共同联系、共同利益和共同利害关系，为改革开放后“东西南北”问题的全面定位奠定了基础。

如前所述，所谓“东方”既是在地理意义上的东方，也是政治地理学语境下的东方，这种双重规定性赋予“东方”以主叙事地位；同时，中国在外交实践中不断生成一系列派生叙事，将亚非拉地区纳入“东方”的话语表达范围。中国外交中的时代方位坐标得以形成叙事联系，表现为使全球发展版图趋于均衡、世界和平基础更为稳固的逻辑。表 1 展示了中国领导人在这一历史阶段确立的“东方”主叙事内容及对象。

表 1 “东方”主叙事的确立及其组合过程中的主要表述

时间	主叙事人	叙事对象	叙事主题
1950—1953 年	毛泽东和周恩来	朝鲜、越南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	民族解放
1954 年	毛泽东	印度	独立自主
1955—1957 年	周恩来	亚非国家	独立自主
1959 年	毛泽东	亚非拉国家	团结联合
1963 年	周恩来	阿拉伯国家	团结联合
1975 年	邓小平	亚欧大陆	团结联合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第二阶段：叙事生产空间的拓展与战略转换

随着时序的演进，中国在处理全球“东西南北”问题以及塑造自身的角色和位置时，一方面维持作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以及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的主叙事，保持了长期稳定；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新叙事的生产空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 441—442 页。

② 《邓副总理举行答谢宴会招待希拉克总理 邓副总理结束在法国的访问离巴黎回国》，载《人民日报》，1975 年 5 月 18 日。

间。中国坚定支持“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独立自主斗争，不断加强与它们的团结联合。在此期间，中国的叙事组合在叙事通道的持续互动进程中获得了新的生产与传播平台。受国际格局的转换以及南北委员会、南南合作会议和南方委员会等叙事主体的影响，^① 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主动且适当地对“南北”问题影响下的“东西”问题进行了新定位。“东—西”与“南—北”叙事组合实现了次序和内容重点调整与转换，正式将“南北”问题提升到与“东西”关系并重的位置，使中国能够更好地统筹内外关系，争取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维护与提高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1985年3月，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的论断，^② 明确指出国际格局“不仅仅有‘南北’、‘东西’问题，还有‘南南’合作问题”，^③ 由此拓宽了“东西南北”方位话语的内涵与外延。自此，中国在执行“对西方开放，也对东方开放；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的进程中，^④ 积极推动东西方关系缓和，通过处理以南北为轴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周边环境、安全环境和舆论环境。

20世纪90年代，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出现了几对复杂的基本矛盾，“南北”矛盾、“南南”矛盾、“西西”矛盾以及新维度的“东西”矛盾都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中的“东西南北”叙事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2000年12月11日，江泽民指出，“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形势是：西强东弱，北富南贫”。^⑤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再次明确：“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① 198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主持的南北委员会发表《北南问题：一项关乎生存与共同危机的计划》报告，提出了推动南方发展的若干建议。参见 Willy Brandt,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Pan World Affairs, 1980。1982年，在印度举行的首次南南合作会议上，世界贸易、金融、能源和资源等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成为南方国家政策的优先议题。1986年，在不结盟运动峰会上，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议成立“南方委员会”。南北问题逐渐突显，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与谈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时代要求。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212页。

④ 《中苏外长举行二三轮会谈 就中苏关系和共同感兴趣的重要问题交换意见》，载《人民日报》，1988年12月4日。

⑤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① 南北问题不再局限于经济关系，还涉及主权独立等政治关系方面的问题，也是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中国在对外政策主张、国家间联合声明、领导人集体会晤和对话会议等多个场合坚持推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主张缩小南北差距，推动南北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

随着冷战结束，在“东西”矛盾消失的背景下，“东西”问题有必要进行新的表述，以体现中国新的身份和战略。中国新的子叙事由此出现并发生了与时俱进的演变，新的子叙事既回应了“南北”方向上的政治与经济诉求，也在“东西”方向上为中国打造了新定位（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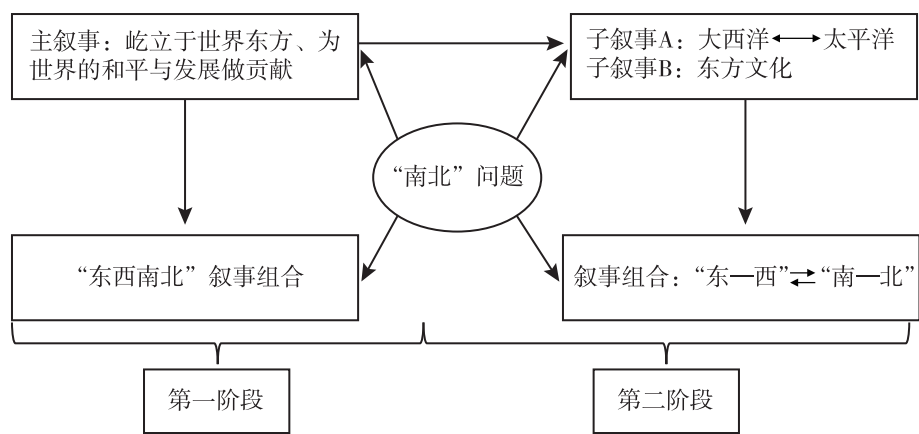


图3 “东西南北”叙事组合的涵化与展开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话语表达上，世界经济发展中心转移与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子叙事为“东西南北”叙事组合方式赋予了新内涵。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太平洋“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的论述，^② 是对世界经济重心乃至权力中心从“大西洋西岸”向“太平洋东岸”，进而向“太平洋西岸”转移的趋势性预见。这一世界历史观念推动政界和学界形成“南北”问题影响下的“东西”问题叙事新定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位。“太平洋问题”逐渐从国际战略稳定与安全问题向世界政治经济问题过渡，“亚洲—太平洋”（即“亚太”）观念也逐渐被各国普遍接受。^①“东西”关系反映的不再是两大阵营和两种制度的对抗，而是在生产和交往普遍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亚欧大陆内部相互关系的转变，即以中国为重心（而非某种等级结构的“中心”）带动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从西方向东方（即广大发展中国家）”“从大西洋向太平洋”^②转移的观点逐渐成为国家间相互身份定位的交往性共识。这一启发式评估过程反映且促生了“东西南北”叙事逻辑的变化。

第二，“东方”的文明内涵为“东西南北”叙事组合的内涵界定提供了另一个叙事维度。国际中心转移和国际格局的形态变化能否使国际体系发生质变，其关键在于国际规范是否会发生改变。^③这一时期的发展实践高度重视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协调一致，重视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如何正确处理东西方文明差异，实现“东方民族”新的觉醒与奋起。1998年11月28日，江泽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亚洲各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东方文明，对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应该“继续弘扬东方文化的优秀传统，同时加强合作，互相帮助”。^④“东方”概念因此便具有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协同效应。2001年5月25日，江泽民在第三届亚欧外长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提出，“亚欧会议应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渠道”，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框架下的“东西南北”问题新发展提供机制性力量。^⑤此后，胡锦涛也在不同国际场合提出了东西文明交流的表述，如在2004年法国文化年开幕式上提出“增进中法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借鉴”，^⑥在2011年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宴会上提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相互学习……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等相

① 刘国胜、魏亚南：《跨越太平洋——记中美工业贸易和经济发展研讨会》，载《人民日报》，1988年6月25日；《世界经济重心将转向亚洲》，载《人民日报》，1988年9月5日。

② 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直坚持世界事务的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观点。参见 Henry Kissinger, “America’s Assignment: What Will We Face in the Next Four Years?” <https://www.henrykissinger.com/articles/americas-assignment-what-will-we-face-in-the-next-four-years/>。2007年，基辛格在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斯克罗夫特的对话中提出，“国际体系正处于百年未遇的变革时期”，他认为国际事务的重点正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参见 David Ignatius, “Wise Advice: Listen, and Engag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4, 2007。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认为，“世界经济的重心已明确地从大西洋转向了太平洋”。参见李光耀：《李光耀观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4页。

③ 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18页。

④ 江泽民：《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载《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9日。

⑤ 江泽民：《在第三届亚欧外长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2001年5月26日。

⑥ 《法国文化年在京隆重开幕 胡锦涛主席希拉克总统分别致贺信》，载《人民日报》，2004年10月11日。

关表述,^① 这一叙事维度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认识论与社会结构层面的现实基础。

通过叙事实践,“东西南北”关系的构建在世界经济交往、文明交流互鉴的共有理解和认知中不断得到巩固和确认。在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准确把握了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期待和追求“和平发展、合作进步”的国际关系全局。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大国,还是亚洲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国家,这种身份定位将自身融入全球“东西南北”关系的语境,有利于增强统筹意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事业。

(三) 第三阶段:叙事维度与路径的重申、再阐释与替换

在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东西南北”关系发生了深刻转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② 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以什么样的身份发挥作用以及发挥怎样的作用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叙事维度与路径上,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特征: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等基础性表述整体体现了主叙事的连续性与权威性。第二,中国需要依托现行国际体系与秩序并在叙事通道的互动进程中将“东西南北”叙事组合引入新的方向,实现调整、重申和替换,以回应国际格局调整与地区中心转移所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就叙事的内部条件而言,中国外交时代方位坐标的叙事组合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身份定位与外交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继承与发展的。中国在既有表述的基础上继续强化了自强、团结以及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叙事。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强调,要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必须重点展示“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③ 2022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以来‘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鲜明对比,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选择”。^④ 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将继续推动南南合作及南北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促

① 胡锦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宴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1年1月21日。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2页。

④ 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载《求是》,2025年第1期,第13页。

进共同发展繁荣”。^① 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由中国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南南合作圆桌会,提出新时期南南合作四大建议,指出“南北关系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世界和平稳定的全局性问题”。^② 这表明中国外交的“东西南北”叙事充分彰显了国家的意志,体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

就叙事的外部条件而言,“东西南北”叙事是在新的战略要求和战略环境下对时代问题进行再阐释、赋予新内涵的过程。国际力量格局的调整以及地区中心的转移主要是由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矛盾共同决定的,战略重心的转移也将使战略竞争性互动程度加剧。^③ 战略重心的东移带来了新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确定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和持续性崛起,其自身的实力、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二是全球南方国家对“西方”与“大西洋道路”的共同认知使其能够审视自身发展困境,有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有效的方向发展。不确定性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方面,特别是美国试图以“印太战略”取代亚太政策,导致地区安全与合作格局面临新的挑战。不确定性致使“东西南北”叙事面临双重压力:其一,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中心—边缘结构导致长期形成的“东西”“南北”不对称叙事出现了新的变化,开始具备明显的大国竞争倾向。^④ 其二,以“亚太”“东方文化”等为标志的子叙事以及区域合作的有效性均受到严重冲击。鉴于此,中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为重要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重塑并拓展“东西南北”的叙事方案,是稳妥应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重要实践(如图4)。

在“东西”方向上,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的升降促使中国在对外关系上调整了相应的叙事维度与评判标准,以适应国际社会力量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在“东西”方向上积极构建与投射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的理由和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各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二是在推动建立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追求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共同

① 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4月23日。

② 《习近平在南南合作圆桌会上发表讲话 阐述新时期南南合作倡议 强调要把南南合作事业推向更高水平》,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8日。

③ 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9页;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7—71页。

④ Leigh Sarty, “East Rising, West Falling: Not So Fast, History Sugges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4, No. 3, 2021, pp. 91–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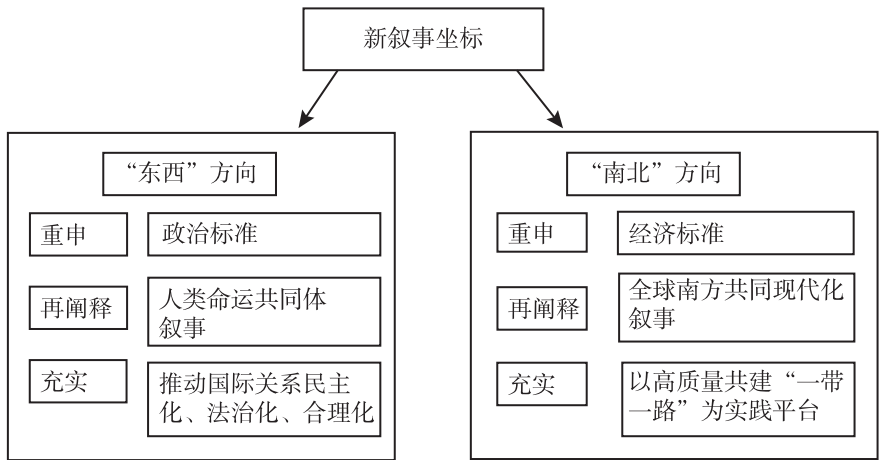


图4 “东西南北”叙事维度与路径的重申、再阐释与充实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体成员通过实践互动逐渐形成了共有观念，使共同体具有活力和持久性。^① 这种面向共同体整体和面向未来的负责任行为与责任意识，契合了“东方”主叙事所蕴含的政治标准，能够有效维系全球“东西南北”中的叙事纽带。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情怀，阐明了应对百年变局的中国主张。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一以贯之地为正确处理国与国关系贡献东方智慧。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和合理化的进程中，中国凝聚的是一种“东方”共识，并着力“实现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从发展到安全、从合作到治理的历史跨越”。^②

在“南北”方向上，实现现代化是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的历史任务。在全球南方国家身份塑造的新阶段，构建全球南方共同体叙事必须以实践为根基，充实叙事的调整、互动与转换逻辑。中国外交在这一方向上积极构建与投射的叙事主要包括三点：其一，全球南方为发展而起，因发展而兴；其二，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其三，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

① 徐进、郭楚：《打造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分析方法与建设路径探索》，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6期，第22—46页。

②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4年6月29日。

全球南方国家团结振兴。^① 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发展的重要载体，能够持续拓宽减贫、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金融和互联互通等全球南方国家关注的重点发展合作领域与边界，推进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助力全球南方提质升级。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明确提出：“我们主张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和各种发展战略的国际合作，建立更紧密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② 中国与众多全球南方国家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广泛合作，构建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开展务实合作项目、支持民间交往，开拓了全球南方国家大范围自主选择与自主合作、互利共赢的全新道路，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源。

构建叙事体系亟须提炼标识性概念。新时代中国外交在全力打造全球南方身份定位过程中，不但促进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开放包容合作，而且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思维，能够体现时代性、通约性和标识性内涵。其中的核心概念有两个：一是践行“正确义利观”，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新时代中国外交坚持正确义利观，强调在对外关系中需要坚持“以义为先”，^③ “义利兼顾”“义利平衡”，从而实现“义利共赢”。^④ 以此为指引，中国全力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特殊处境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同发展中国家实现集体对话机制全覆盖、各领域合作全覆盖，从而引领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开放和共同开放。二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新时代中国外交致力于维护和推广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⑤ 并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⑥ 这种战略叙事契合各类主体的

① 习近平：《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4 年 10 月 25 日；习近平：《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关于“抗击饥饿与贫困”议题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4 年 11 月 20 日。

②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17 年 5 月 16 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2021 年 11 月），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6 页。

④ 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 年 9 月 27 日。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22 页。

⑥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7 日。

基本需求,充分考虑了各类主体历史经纬和时空条件的共同价值,^① 强调超越南北差异,形成共通性的价值理念及其理解。以此为导向,中国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塑造新型国际秩序,通过引入上述标识性概念,中国的外交叙事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当今时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面临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性的诸多挑战。在“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的共同坐标中,中国将发挥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多重作用。“东西南北”叙事转换的最终目标是摆脱冲击—反应模式,在综合“南北”之变、新旧之变与大国关系之变的基础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东西南北”关系的再定位已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既使“东升西降”叙事超越了简单的东西方关系甚至中西关系,也使我们对全球南方的思考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分析方式。着眼全局,中国在全球“东西南北”问题中的叙事逻辑实现了稳定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的深层融合。

五、结论

确定时代方位坐标是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条件之一。以“东西南北”为表征的时代坐标方位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命题,并在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等方面不断更新。在这种变化及相互交织和相互指涉的关系中,“东西南北”问题中的叙事因素愈加突显。深刻理解这一叙事的演进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认识基础,有助于更好地对中国外交的出发点、方针及关键议题寻根溯源、发现规律。

本文归纳了国际格局的“东升西降”与全球南方“联合自强”趋势的叙事基础、条件及演进过程,描绘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所体现的国家身份的开放性。中国外交中的“东西南北”叙事为世界大变局下的中国外交建立了一个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解释框架。随着时序的改变,中国对“东西南北”问题的主叙事也在不断发生演进。首先,中国的主叙事表现为确定“屹立于世界东方”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贡献,进而为新中国的国际身份建构与战略定

^① 新华社研究院:《回应时代呼唤 解答世界之问——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供给与贡献》, <http://www.news.cn/20250906/d21feec5f9f04ffebd1ec9824cd98329/c.html>。

位奠定了话语基础。围绕主叙事,“民族解放”“独立自主”“团结联合”等子叙事在特定历史节点的交汇不仅回应了东西方阵营格局下的国际压力,也建构了社会主义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整个第三世界的联结路径,提供了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组合。其次,基于变化的国际条件,中国将“东西南北”叙事依据既定的叙事目的组织起来。“东西”“南北”关系能够有机地联系并形成复合叙事策略组合,进而通过叙事通道实现交汇、融入世界语境,适应了以“南北问题为核心”的时代背景,使和平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通过引入新的关键子叙事,中国强化了世界政治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转移的“东西”方向的趋势,强化了亚欧大陆是同一个大陆的整体共识,强调东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相向发展的道义力量,使叙事维度向发展和文明等方向延展。最后,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变革和动荡两种趋势持续演进,使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东西南北”叙事涵盖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内容。为适应国际关系的发展,中国充分评估了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实践平台重塑“东西南北”问题中的“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对叙事进行了调整、重申、替换与再阐释。

本文的分析框架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全球东方”的污名化叙事以及西方国家将全球南方视为争夺空间的异质性叙事,对推进全球南方共同体叙事以及提升中国在全球“东西南北”话语和叙事体系中的构建能力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当前,中国已经能够更多把握历史主动、更大程度地影响世界发展方向。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外交在不断塑造自身独特风范的同时,应更加注重深刻把握世界上不同受众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情况,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互惠合作和彼此理解,形成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不断促进“东西南北”关系叙事朝着有利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赵远良)

plex phenomenon, 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logic behind actors' differentiated choices.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varied pathways of strategic autonomy, extracts the common theoretical elements behind these choices, constructs a causal mechanism of differentiated strategic autonomy, and develops a general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External dependence is treated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precondition. Strategic preferences formed through expectations of dependency relations shape the rationality of actors' strategic choices, while role identity influences strategic autonomy choices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The calculation of interests involved in changing existing dependency structures serves as the driving force that activates the core mechanism, and at critical junctures, this mechanism promotes path substitution in the pursuit of autonomy. Through heterogeneous case analysis, the core hypotheses are verified.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these variables produce differentiated strategic autonomy choices, and different pathways lead to different outcomes. This finding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strategic autonomy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evaluating strategic autonomy choices.

【Keywords】 strategic autonomy, external dependence, strategic preference, role identity, strategic choice

【Authors】 MEN Honghu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ion for China and World Studies, Tongji University; HUANG Shicheng, Master's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A Narrative Constellation Analysis of China's Diplomatic 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of the Times

XU Jin YANG Jialin (74)

【Abstract】 The East-West and South-North dynamics in China's diplomacy contribute to assessing key featur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including power configuration,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of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the East-West and North-South narratives have continuously adjusted their respective connotations and priorities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among states, making the strateg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more specific and operable. Starting from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mechanism explanation, and analytical inferences,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generation-combination-evolu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ast-West" and "South-North" narratives. Taking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empirical cases, it examines the formation, combination, and adjustment paths of the narrative constellation in China's diplomacy. As momentous changes of a

like not seen in a century are accelerating across the world, historic changes are taking place in the East-West and South-North dynamics. East-West relations have undergone historic shifts marked by shifting dynamics, while the “East Rising, West Declining” paradigm and Global South discourse have entered phases of adjustment, iteration, and mutu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constellation, it is possible not only to analyze the discursive context, shaping process,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East-West and South-North narratives, but also to grasp new dynamics more effectively in the adjustment, differentiation, and regrou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Keywords】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of the times, narrative constellation, East-West and South-North, Global South

【Authors】XU Jin,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Global and Reg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Senior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ANG Jialin, Ph. 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Global and Reg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rrative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Global Governance

YUE Shengsong (96)

【Abstract】The escalating narrative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glob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critical le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By constructing a three-tier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eta-narrative—strategic narrative—operational narrative” and following the “narrative-practice” dual-cycle logic,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e narrative practices of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fields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governance. It finds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Sino-US narrative competition lies in a process in which the Western narrative has fallen into a “validity crisis” due to practical failures, while the Chinese narrative has enhanced its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positive validity. The US-led liberal internationalist narrative has fallen into a negative cycle of “swinging—introversion—dissipation”, with its narrative credibility continuously eroding. By contrast, China’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narrative has achieved a positive cycle of “coherence—expansion—accumulation” through successful landmark practices, steadily enhancing its narrative credibility.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for the future of Sino-US narrative competition is the formation of a new form of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in which discursive 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 will gradually become decentralized and democratized. The rules and paradigms of global governance will no longer be monopolized by a single hegemon but will be dynamically generat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nd validity competition among multiple actors. This study helps deepen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order